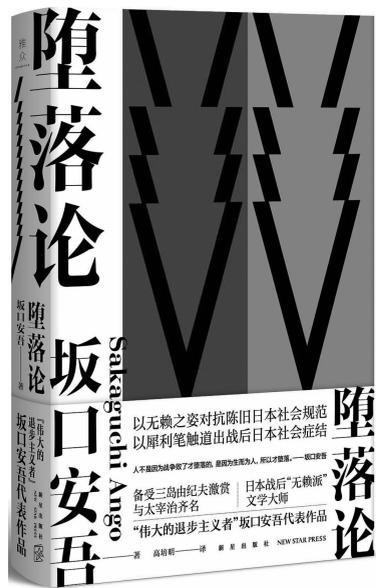


# 回归人性的常态

所谓“堕落”，在坂口安吾的语境中其实并不是一个贬义词，而是正视和顺应人的本性



《墮落論》  
[日]坂口安吾  
新星出版社  
2018年8月

坂口安吾是日本无赖派文学的代表人物——所谓“无赖派”，是指二战结束后活跃于日本文坛的一个重要作家流派。他们主要记录日本战后虚无、混乱的社会状况，有着反抗权威的个人意识，对生活则大多采取自嘲和自虐的态度，从文学的角度反映出战后日本人的道德观和伦理观，以及他们普遍的失落与迷茫。除了坂口安吾之外，无赖派文学的代表人物还包括太宰治和田中光英等人——1948年，太宰治投水自尽，1949年，

田中光英自杀身亡，1955年，坂口安吾因脑溢血逝世，随着他们的先后离世，无赖派文学逐渐走向式微，而日本的历史亦已翻开新的一页。

《墮落論》是坂口安吾的一部随笔集，其中收录了他的十七篇代表性随笔和评论文章，这些文章虽然大多篇幅短小，却颇能显示出坂口安吾的思想个性与文字风格：思想尖刻，眼光犀利，字里行间，既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割切，又有一种一针见血、不留余地的毒舌特质；那种玩世不恭的文笔，既让人留恋难舍，又常常因其旁若无人直言不讳，而让人感到窘迫、甚至恼怒。所谓“堕落”，在坂口安吾的语境中其实并不是一个贬义词，而是包含着个性解放、人格蜕变、乃至从身体到精神完全脱胎换骨的意思——正视人的本性，顺应人的本性，从世俗社会通行的道德伦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，正是坂口安吾反复论证、一再强调的重点，也是开启坂口安吾文学世界的一把钥匙。如果放在战后日本的时代背景下去考量，坂口安吾这些反省现实的文字，对彼时的日本人无疑有着当头棒喝、醍醐灌顶的功效，为他们的个人选择提供了某种精神支持。

坂口安吾的文字涵盖了日本传统文化与国民性的各个层面，他常常从日本传统文化中溯本求源，来剖析日本人文化个性的形成。在坂口安吾看来，随性是一种日本人共有的感情，他们擅长从模仿走向发现，最为看重的则是生活的必须。有了这样的共性，即便古代文化全部毁灭，但只要生活还在进行，生活自身就不会毁灭，日本人的个性就是健康的，因为他们并没有丧失自身的需要和与之相应的欲求。所以，低俗并不可怕，既然低俗了，就不妨豁达自在低俗一番；古老文化的消亡并不可怕，因为它要么衰落消亡，要么脱胎再生，既然势在必行，就不妨从容面对。以官本武藏的剑术为例，虽然他在

比剑时从来抱必死之心，而是像凡夫俗子一般怕死，并时时考虑着如何战胜对手，反因此获得了求生的机会。坂口安吾批驳了武士道的背离常理与违反人性，指出死亡很简单，生存却并非易事——凡此种种，对战后日本社会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

堕落，无疑是坂口安吾文字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。战前的日本，人们单纯、充实，他们有命运，没有堕落；战后的日本则恰恰相反，过去的勇士变成了黑市商人，丧偶的圣女另觅新欢……坂口安吾认为，堕落与战争并没有什么关系，人不是因为战败才堕落，而是人性本恶，但凡是人，总会从义士堕落为凡人，战争并没有改变人，战后的人们只是重新变回了人。坂口安吾又将堕落的概念进一步引申到天皇制上，指出天皇一直都是军国主义者的工具，他们随心所欲地拥立天皇，自己跪倒在天皇面前，再利用天皇的尊严来号令天下。这正是天皇制的真相，也正是日本历史赤裸裸的真相，日本人恰恰是被这历史的巧妙计谋附体，才最终披上了虚伪的外衣，丧失了人性的正常姿态，同时也失去了真实的生活。

那么，人性的正常姿态究竟是怎样的呢？说出来很简单，不过是想要的东西老老实实地去追求，讨厌的东西光明正大地去讨厌，把大义名分、义理人情这些虚假的外衣全部脱掉，袒露赤诚之心，仅此而已。总之，人性的本相就是如此，人必须具备彻底堕落的顽强精神，才能拥有完整的自我，回归真正的人性。坂口安吾这样说道：“真正的伦理是不健全的，因为它的精神基调是对现实的叛逆，它必定会对伦理本身进行自我摧毁。”于是，坂口安吾呼吁日本人与日本自身的堕落，为了过上真正的生活，为了拯救被扭曲的天性，他的结论是，日本与日本人必须堕落！

王焱

## 沈乔生归来

小说写到最后，较量的往往是见识的高低



《女皇号游轮》  
沈乔生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2018年10月

沈乔生新出版了一本小说集，唤做《女皇号游轮》。书中收录了沈乔生先生的12篇小说，这些小说，跨度时间很长，有新近完成的，也有上世纪九十年代写就的，还有并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与地点的；这些小说，内容很丰富，题材很广泛，有知青题材的，有关于股海风波的，有关于时代嬗变知青回城的，有域外生活的，有文人落寞事态苍凉的。

这些文本虽然不能说篇篇精彩、部部经典，但书中的大多数文本，能够经受住时间的磨砺和岁月的淘洗，还能引人入胜，令人不忍释手，实在是很难得，原因何在？就在于这些文本都在真诚地讲述一个故事。把故事说好，看似简单，但要进入实际操作，去除杂念，屏心静气，只管耕耘，并非易事。故事的选择截取，显示出一个讲述者的眼光、气度，更要看一个讲述者的修养沉淀，还需要驾驭故事的才华才情。

小说写到最后，较量的往往是一种见识的高低，是一种对时代的把握，是一种不人云亦云、保持清醒的独自坚守。鲁迅的伟大，原因很多，最为可贵的是他的见识深邃，高出常人。即使是现在，一个有出息的写作者，往往不在于你文字功夫如何了得、书外的功夫如何了得，要害还是你的见识。《书痴》写谭一池、赵天石、朱凤来，真是见识高远、入木三分；《无檐软帽》，一波三折，写一个文字贩卖者的情非得已、半推半就，最终的尴尬难堪、残局难收，小说不在其峰回路转，更在于在见识上的高人一筹。

沈乔生的小说，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与浓烈的历史情结。《血书》《上大学》这些知青题材的故事，今日重温，近乎荒诞和不近情理，却吻合当时的历史情境。沧海桑田，时代嬗变，多少当年以知青身份跃身文坛的作家，如梁晓声、张抗抗、叶辛等，或功成名就，或退隐江湖，或隐身远行，但沈乔生仍不能忘怀，不过他的笔下没有了当年这类小说中充斥的呼天抢地、愤愤不平、激烈控诉，文本呈现更为平实深刻，人性拷问更为犀利直接，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，更需要责任和担当。沈乔生也是一位有着多种素养准备的作家，对文字表达有着极高的审美追求。《小月迢迢》《娉石》等，看似不事雕琢，字里行间却跃动着古典温婉之美。

雷雨

# 在河流与柴火里，“活捉”伍里川

透过这些文字，你可以“活捉”到一个真实的伍里川，他的芳华、他的愤怒以及他的坚守和笃定



《河流与柴火》  
伍里川  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
2018年6月

伍里川是我的同事，也是我的朋友。之所以成为朋友，我想是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少数派。

既然是少数，就不会去做多数的事，不会去追星，不会去羡慕一茬一茬的商业大

佬。如果这个时代是金色的，我们看上去要暗淡一些。金色会闪耀出刺眼的光芒，而暗淡也有自己的力量。比如伍里川的文字，它一点也不耀眼，但它的暗淡却能吸引你走近它、端详它，它如同一张张黑白照片，褪去光芒的同时，露出了真实与真相。

这本书收录的多数文章我都看过，印象深刻。印象最深的是写故乡的文字。故乡，是一个具象与抽象兼具的文字。对于多数人来说，故乡一开始都是具体的所在，可以触摸，可以在其间肆意奔跑和撒欢，甚至可以用来撒娇和依赖的；后来，故乡变得抽象起来，它被专门用来离开，被用来怀念和长久生了病般的挥之不去。这是一种主流的经历和主流的情感。但在伍里川那里，故乡是用来愤怒的，是用来点燃胸中的怒火的。在地理现实中，伍里川与故乡并不遥远，只要他愿意，他可以随时回到儿时生活的地方，但在情感现实中，他却无法还乡、回家——因为他的故乡在一轮拆迁热中已经被彻底荡平了。

伍里川的愤怒是粗犷的，从他的文字中，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种被剥夺后的伤痛，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时代之痛。关于故乡，除却这种激烈的情绪，你还可以从更多的文字中感受到一种由外及里的温情脉脉。伍里川用了很多篇幅去描述故乡的人、物、风俗、历史、文化，这些都是他的记忆，一种失去后的记忆显然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，而当你沉浸在一种对美好事物的记忆时，这种色彩尤为强烈。

伍里川的本质工作是时事评论员，他的评论文字有着很好的口碑，但作为朋友，我

更喜欢他那些看上去更为随性的回忆性散文。儿时、故乡、部队、报社……他有一个丰富的记忆库，似乎他走到哪里，哪里就会有故事发生。在这些朴实、亲切而又不乏幽默的文字中，你可以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和事，可以见识到不同年代的不同风物，同时也可以变化之中捕捉到作者始终不变的为人之道。

在单位时，伍里川在7楼，我在6楼。每天下午3点半，我们都会去7楼同一个会议室参加同一个会，然后作鸟兽散，形同路人。但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吃一次饭，轮流坐庄。因为他吃完饭还要上夜班写社评，所以地点都选在单位附近，有时候在红庙，有时候在华侨路，有时候在估衣廊，大都是些苍蝇馆子。两个老男人一人一瓶啤酒，百十块钱的菜，然后瞎聊。

伍里川要小我几岁，但他的经历要比我丰富得多，还有就是他的记忆力太厉害了，不像我对十几二十年前的事只能记得个大概，最多对一些重要节点的事情印象比较深，而他对过去经历的人和事可以说是过目不忘。我差不多就是在这些一周一次两个人的饭局上，与他口中的人和事不期而遇，同时这些被淡淡的酒精唤醒的记忆也逐渐丰富了我对伍里川的认识。

这一次，伍里川把这些记忆写进了《河流与柴火》里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本书应该可以看成是他的自传，透过这些文字，你可以“活捉”到一个真实的伍里川，他的芳华、他的愤怒以及他的坚守和笃定。

孟秋